
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石 硕

摘 要: 如何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文章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汉族的形成、壮大、性质、特点及其同少数民族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汉族之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中也吸纳和包含了大量汉人成份,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界线,无论历史与现实,均相互流动并紧密依存。汉族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其复合性和巨大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与少数民族因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而存在经济类型差异,但经济类型差异及由此所形成的互补,恰恰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度依存、密切联系的原因。这种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的体现。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成为一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多样性的有机整体,这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髓所在。为此,须杜绝和改变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或对立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 汉族 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 共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这涉及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从民族角度看,我国的另一个重要国情是,在 56 个民族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华民族概念及历史脉络研究”(21VMZ015)的阶段性成果。

口数量与分布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据202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8.89%,少数民族地区占地面积达我国版图的60%左右,汉族占我国总人口的91.11%。^①这一巨大反差和不平衡是由历史造成的,也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但在我国的辽阔疆域和众多民族中,无论是人口数量庞大的汉族,还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并非割裂,而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并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身边一些人在言谈话语中,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作截然分割甚至对立,这种观念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处,也常不自觉地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中。把“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甚至对立的观念,很大程度缘于人们对二者内涵、特点与性质在认知上存在误解和偏差。这既影响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认识,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无形障碍。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很大程度正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上。因此,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非常必要。为澄清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与偏差,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试对该问题做一讨论。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已有不少精辟论述,本文拟以此为基础,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对此问题做一较集中的讨论。

一、谁是“汉人”:从“汉人”到“汉族”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②如何看待此观点,直接关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如何认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我国56个民族中,汉族不仅人口数量最多,内涵和构成亦最为复杂。我们首先要问:谁是汉族?汉族由何而来?

众所周知,今天的汉族,历史上及史籍中被称作“汉人”。汉人的名称来源于汉朝,意谓“汉朝之人”。“汉人”称谓出现于东汉后期。西晋末年,由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被称作“胡人”的北方民族大举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为区分“胡人”与原汉

^① 宁吉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中国统计》2021年第5期,第5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7页。但随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今天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着大量汉族,汉族聚居区也生活着大量少数民族的情况,已愈来愈成为常态。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7页。

朝治下的民众,“汉人”称谓便逐渐兴起和流行。^①从史籍记载看,“汉人”称谓的流行主要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因该称谓简明通俗,易于传播,从南北朝到隋唐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汉人”始终成为对中国主体人群使用最广泛的一个俗称。^②近代,因“民族”概念的传入,加之清朝解体后确定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建国方略,“汉人”称谓逐渐被“汉族”所替代。^③这便是今天“汉族”的由来。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相对宽泛、模糊的概念,其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单以狭义的“汉人”即汉朝治下的人而言,春秋战国时的秦人、楚人、吴人、越人,都曾被视作“蛮夷”,^④秦人中更包含和吸纳了大量“戎人”成份,^⑤但在秦汉统一后,他们都被纳入汉朝治下,成了“汉人”。两汉时期大规模开疆拓土,北击匈奴,东北征服朝鲜,经营西域,开西南夷,南灭南越、闽越,开拓南越与岭南之地,把诸多周边民族直接纳入汉朝治下。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降汉朝后,大量匈奴人被安置在今山西、河北一带,定居务农,与汉人杂处,大多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⑥

从十六国及南北朝持续近400余年的南北民族大融合使胡汉界线渐趋模糊。贾敬颜指出:

纵观十六国、北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北方及西北少数民族大量进入黄河流域,他们与汉人杂居相处,互相交往,出现了民族间的大吸收,大融合,而其总的趋势则是化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经十六国、北朝以后,汉人的内容复杂了,数量增多了,这个人们共同体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⑦

隋唐统一以后,民族间的隔膜渐趋模糊,各种民族成份逐渐融合一体。唐太宗被西北各民族政权奉为“天可汗”,唐朝在军事上主要靠“蕃将”(少数民族将领)支撑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6页。

② 历史上对“汉人”比较书面和文雅的称谓是“中国人”“华人”等,与之相比,“汉人”主要盛行于民间,当为“俗称”。

③ 贾敬颜指出,中华民国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以它们为代表的“五族共和”表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实,当时的蒙、回、藏并不限于单一的民族,大概也只是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参见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02页。

④ 《史记·楚世家》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参见《史记》卷40《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95页。

⑤ 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264页。

⑥ 彭清深《内迁与融合: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互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46-47页。

⑦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02页。

和维系,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①等等,均是民族融合带来的新气象。唐朝是十六国及南北朝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开花结果”时期。陈寅恪在谈到唐朝恢宏博大的气象时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②费孝通也说“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份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③至今海外多称华人为“唐人”,称华人聚居区为“唐人街”,“唐人”与“汉人”的概念一样,均以强盛统一王朝之名来指称中国主体人群。所以,唐代是“汉人”这个群体迅速扩大时期。

继隋唐大一统后,中国再次进入一个大规模、长时段的民族交汇时期,这就是辽、宋、夏、金及元朝时期。这一时期,“汉人”与北方民族交融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时,“汉人”的内涵与规模也得到极大拓展。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因统治区域内存在大量汉人,实行两种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④辽朝实际上兼括了契丹与汉人两大民族系统,这是其政权能延续两百余年的原因,也造成契丹人与汉人之间的互相融合。金朝时所言“汉人”者,包括了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可见,金人的“汉人”语义和内涵,较南北朝时的“汉人”已大为拓展。在此背景下,不仅“汉人”一词指中国人,在周边邻国的话语中,“契丹”一词也同样成为“中国”的代称。^⑤

金朝时将分布于幽燕十六州的汉人称作“燕人”,将宋人称作“南人”。元朝统一后,基本承袭了金朝“汉人”称谓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元时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均被包括在“汉人”之内。“南人”则指原宋朝治下的“汉人”。元代“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⑥辽、金交替之际,已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之说;元世宗大定年间也有“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的说法。^⑦这些说法和人群划分均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融合情况。

元朝的统治造成蒙古人、色目人大量散布于中原地域及南方各地。在元、明交替以后,这些散布于全国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因与汉人杂处,相互通婚,也走上逐步与汉人融

① 《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8页。

④ 《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85页。

⑤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7页。

⑥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赵世延杨朵儿只皆色目》,陈文和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⑦ 《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4页。“猛安人”即女真人,金朝以“猛安谋克”机构来组织和武装女真人。

合的道路。明人顾炎武称“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①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变革旧制,令衣冠如唐朝,“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②这些强制改变胡俗、胡姓的措施,加快了明代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的融合。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仁上疏称“臣近来窃观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③对此,顾炎武曾站在汉文化立场感叹道:“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物辨物之道。”^④故有明一代,散布于明朝统治区内的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通过改胡俗、改汉姓,与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逐渐变成了“汉人”,使汉人的构成及其外延得到进一步扩展。

清朝是满人入关建立的王朝,其民族等级是满、蒙、汉。尽管在清朝前期满族统治者为防止汉人对满人的同化,采取了诸多限制与防范措施,但在清朝结束进入民国时代,绝大多数满族均被划入或融入“汉人”之中。^⑤

从民族角度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汉人”的壮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尚以“华夏”自诩,并以此来与周边“夷狄”“蛮夷”相区分,那么,在十六国和南北朝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汉人”群体的扩大,“汉人”开始取代“华夏”,成为一个更宽泛、更庞大的民族实体和概念。所以,“汉人”的壮大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流。自秦汉以降,中国的整体性与共同性,很大程度正是通过“汉族”形成与发展得到充分体现。有鉴于此,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阶段性的: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⑥

从“华夏”到“汉人”,再到近代的“汉族”以及“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凝聚核心”,这是费孝通基于中国历史客观事实做出的准确判断。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3《二字姓改一字》,《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83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版,第52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109,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第1815-1816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23《二字姓改一字》,《顾炎武全集》第19册,第884页。

^⑤ 1936年郭维屏所编《中华民族发展史》称,满族“与汉族同化,所谓满族,几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反映出民国时代人们的看法。参见郭维屏编《中华民族发展史》,发行者冯月樵,成都球新印刷厂印1936年版,第4页。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5-7页。

二、“汉族”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其复合性和巨大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这导致汉族的构成相当复杂。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汉族”这一庞大共同体的特点与性质?

首先,历史上的“汉人”即今天所言的“汉族”主要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对此,学界已有高度共识。贾敬颜《“汉人”考》指出:“汉民族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这个巨大的人们共同体系数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汇合而成。”^①费孝通也指出:“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②顾颉刚云:“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③陈连开也指出:“汉族始终是在吸收、涵化众多来源的族人和优秀文化实现大融合中形成、发展、壮大的。”^④汉族的形成与壮大在于对众多民族成份的吸纳与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汉人”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如果说“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⑤那么汉族的形成正是历史上民族融合产生的最大“果实”。

历史上“汉人”为何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其他民族成份?“汉人”是靠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此问题颇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以为,对“汉人”源源不断吸纳和接受其他民族成份的原因,我们大体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第一,“汉人”称谓和概念的模糊性、笼统性及由此带来的“低门槛”,使其较容易吸纳和接受其他民族。

“汉人”的形成与壮大和“汉人”这一名称有极大关系。“汉人”是以中原王朝之名形成的一个人群称谓,此名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民族称谓。这一原因,使其内涵与外延均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笼统性。这种模糊性和笼统性使“汉人”的称谓具有较宽泛的文化与地域含义。^⑥这一特点,赋予“汉人”这一称谓及概念以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因“汉人”名称不是民族的称谓,其民族界线和区分均较模糊,这带来一个重要结果——使其他民族进入“汉人”行列的门槛极低。因历史进程中

①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09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8页。

③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④ 陈连开《汉民族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在第四届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第5页。

⑤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⑥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99-109页。

始终源源不断有新的民族成份加入,每当有新的民族进入并建立起新的王朝或政权之时,前朝治下的人往往就笼而统之地被归入模糊性极强的“汉人”序列之中。如此轮转递续,使“汉人”这一群体得以不断壮大。例如,十六国、南北朝时所有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处的北方民族,经过隋唐大一统之后,其同汉人的界线逐渐模糊、消弭。到了宋代,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被归入到“汉人”这一庞大人群之中。又如,辽朝时,契丹人、汉人、渤海人三者尚有一定界线和区分,但到金取代辽以后,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均一概被归入“汉人”行列。到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汉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契丹人、高丽人被归入“汉人”,就连大部分的金人(女真人)也被归入到“汉人”之中。清朝统治时期,满、汉之间尚有较明确的界线与区分,但清朝灭亡后,满、汉界线就趋于模糊和消失。到民国时期,所有生活于内地并与汉人杂处的满人都被归入“汉人”行列,在心理与认同上也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所以,“汉人”这一称谓和概念的模糊性、笼统性及由此带来的“低门槛”,赋予“汉人”群体以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能够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众多民族成份,能够最大限度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二,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既使“汉人”具有极强稳定性、延续性,并成为汉人消解其与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汉人得以壮大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其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则来自该人群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恰如费孝通指出:

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①

这是对汉族凝聚力的一个洞见。农业不但是汉族,事实上,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根基。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说。他依据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和内涵,将中国早期文明划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以中原文化区为中心的旱地农业区、长江以南以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为中心的稻作农业区以及中原旱地农业区西部和北部外围地区的狩猎采集文化区。^②数千年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交融,汇聚始终围绕以中原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以南的稻作农业区为中心地域来进行。旱地与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并列与相互依存,不但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也是以农业为生计方式的“汉人”群体得以形成、发展并不断壮大、绵延之根本。同时,农业经济也是历史上“汉人”抵御、化解来自狩猎采集文化区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并赖以消弭其民族与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突出表现于两点: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7页。

②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47-49页。

1. 每当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 给中原带来巨大冲击时 ,中原地区从事旱作农业的人群往往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 ,以此来抗御和消解北方民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因长江以南同样是农业地区 ,而且是粮食产量更高、更富庶的稻作农业区 ,使中原移民能很快适应并站稳脚跟。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以及辽宋夏金和元朝时期 ,中原地区的“汉人”农耕人群大多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的方式 ,来规避、消解北方民族南下的冲击与压力。另一方面 ,隋唐时期 ,中原作为庞大的政治中心和人口稠密区 ,其粮食与税收均离不开南方富庶的稻作农业区的支撑 ,这正是大运河得以开凿的原因。^① 所以 ,正是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区并列及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和互补 ,赋予中华文明极强的稳定性、延续性 ,也赋予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汉人”以极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始终以两大农业区为依托。毫无疑问 ,中原旱作、江南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互补与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及地域上所提供的巨大回旋空间 ,赋予“汉人”群体以极大的稳定性和韧性 ,成为“汉人”能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依据。

2. 进入中原及农耕地区的北方民族 ,一旦在中原或农耕地区立足 ,就不得不选择与汉人杂处、定居和农耕经济生活方式 ,假以时日 ,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农耕经济生活和汉文化熏染 ,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 ,亦成为汉人消弭其与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东汉初年 ,南匈奴归附汉朝 ,东汉朝廷将其大量安置于山西、河北至宁夏一带 ,让其与农耕“汉人”杂处。^② 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战乱之际 ,这些成份复杂的匈奴降部 ,逐渐扩散于整个华北地域。趁永嘉之乱占据中原建立政权的“五胡”大都出自于此。他们所以能够立足中原 ,一是逐渐从事农业 ,二是如钱穆所言“诸胡杂居内地 ,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③

唐贞观时 ,东突厥归降唐朝 ,朝臣议论其安置时即称“因其归命 ,分其种落 ,俘之河南 ,散属州县 ,各使耕田 ,变其风俗 ,百万胡虏 ,可得化而为汉 ,则中国有加户之利 ,塞北常空矣。”^④从“使其耕田 ,变其风俗 ,百万胡虏 ,可得化而为汉”可知 ,中原王朝及士人不仅深知“耕田”和同汉人杂处之“定居”生活可让胡人“化而为汉” ,且有意愿运用此方式和手段来化解和消弭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差异。故唐太宗完全采用东汉光武帝安置南匈奴的办法 ,将归降的东突厥安置于五原塞下 ,“既全其部

① 参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32 页;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8-209 页。

② 《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940-2962 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54-261 页。

④ 《旧唐书》卷 61《温大雅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361 页。

落 得为捍蔽 又不离其土俗 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 其入居长安者且万家。”^①使突厥人的汉化成为唐朝北方民族汉化的一个代表。

历史上 中原王朝将归降内附的周边民族、部落安置于其统治疆域内的例子不胜枚举。梁启超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地广人稀 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 徙置之结果 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②历代中央王朝屡屡将归附之周边民族安置于农业区与汉人杂处 所起作用正是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感化合”。

历史上 北方游牧民族融入“汉人”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农业经济的稳定性远强于游牧经济 所以 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北方民族融入定居和从事农业经济的“汉人”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此即梁启超所称“甲时代所谓夷狄者 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③

第三，“汉人”是融合出来的民族 其复合性特点赋予“汉人”以极大包容性。

最能说明汉人包容性的一个例子 是北宋真宗年间曾有一支犹太人迁徙到开封 后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④ 犹太人很早失去祖国 流散于欧洲及世界各地。但迁徙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大多仍能保持自己的信仰与认同。唯迁入中国的犹太人却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根本原因在于汉人对外来民族十分包容 排斥较少 因感受不到民族与文化上的排斥和压力 自身的认同就渐渐松弛 加之同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 遂融入“汉人”之中。关于“汉人”的包容性 谭其骧指出：

汉民族自古以来 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华夏 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他族。凡他族之与华夏杂居者 但须习我衣冠 沐我文教 即不复以异族视之 久而其人遂亦不知其为异族矣。故汉民族同化异族之能力 极其伟大。^⑤

我以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 汉族在一个民族里 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共许共存共容的态度 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 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 进一步又互相渗透 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这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 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⑥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难观察到一个显著事实：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 汉族的民族观念及民族界线是最淡薄的。民族观念淡薄和民族界线模糊 文化上排他性少 赋予汉族以极大的包容性 使其擅长同疆域内各个民族打交道 能深入偏远乃至人迹罕至

① 《旧唐书》卷 61《温大雅传》第 2361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3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 4 页。

④ 魏千志《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学月刊》1993 年第 5 期，第 41 页。

⑤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6 页。

⑥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第 196 页。

的民族地区从事各种营生。据笔者所知的一个例子,从新疆叶城通往西藏阿里的新藏公路,因海拔极高,沿途几乎没有村庄,也没有人烟,一路上如同在月球上行车。但途中却有一个补给点,是几位来自四川的汉人,支起一顶帐篷,用烧油的喷枪为过往车辆提供开水和方便面。其实,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每一个偏远角落,往往都能意想不到地看到汉人活动的踪影。汉人能够深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各个偏远之地,一方面表明其生存能力极强,另一方面也与汉族民族观念淡薄、主观上民族界线模糊有极大关系。

从很大程度上说,“汉族”的巨大包容性,正是其能够在中华民族中发挥“核心凝聚”作用的原因。所以,“汉族”作为民族融合体所具有的复合性与包容性,实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其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凝聚核心”之关键。^①

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界线,二者紧密依存并相互流动

为什么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界线?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今天的汉族之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汉族之中几乎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民族成份。也就是说,今少数民族先民及其文化成份大多可以在汉族中觅见其踪影。正因为如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这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因。诚如顾颉刚所言:

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②

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③

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④

谭其骧也指出:

历史上民族之与汉族发生同化作用者,以来自北方者为著。……故自来言民族史者皆知今日中国北部人口中,富有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满洲等族之血液。以此为据,或又引而伸之,遂谓中国人血液愈北愈杂,愈南愈纯粹。其说颇为一般人所崇信。殊不知按之史实,则北方人中固多东胡、北狄人之血液,南方人中亦不少蛮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7页。

②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③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④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族之血液,北方人之血液固极复杂,南方人之血液,亦不得谓为纯粹。^①

在中国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中,许多古代民族消失了,如匈奴、鲜卑、月氏、乌孙、突厥、粟特、回纥、契丹、党项、女真等等。但这些民族,消失的其实只是民族称谓而已,而并不等于他们被消灭或消亡。他们中除一部分向外迁徙,^②主要是融入“汉人”之中。所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汉人”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乃因其是最大和最终的接受者与容纳者,“汉人”的壮大是“海纳百川”之结果。因此,“汉人”是历史形成的兼容性与包容度极大的民族融合体。

需要指出,历史上“汉人”的构成与内涵是不断变化的。魏晋南北朝时的“汉人”,同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汉人”,虽用的是同一个词,但其构成与内涵已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总体趋势是,随着“汉人”源源不断地容纳和接受各种民族成份,其同疆域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是朝着日益紧密、依存度愈来愈高的方向演进。

第二,今天的少数民族中,也吸纳和包含了大量汉人成份。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除进入农耕地区的各民族源源不断被吸纳到汉人这一庞大群体外,还存在另一种民族融合方式——汉人的“夷化”。如果说前者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那么,汉人的“夷化”,作为与之对应的一种逆向融合,则是对民族融合主流方式的重要补充。这两种融合方式在历史上是同步进行的,且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③,最终交融汇聚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具有高度共同性的中华民族。

历史上,每遇战乱、饥荒、逃避不堪重负的税赋、家庭突遭变故等原因,也造成中原农耕区域的汉人大量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逃亡、扩散和迁徙。这些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数代以后,往往“自愿地,非自愿地,渐渐地变化为少数民族”。^④这种逆向进行的民族融合,不仅伴随中国历史的始终,从未中断,且数量相当可观,成为历史上民族交融汇聚的另一重要方式。费孝通将这一融合方式称为“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⑤,这里所谓“其他民族”即指中国少数民族。

在汉代与匈奴的战争过程中,汉人与匈奴人的融合也在民间层面同步进行。在汉与匈奴战争期间,匈奴大量劫掠汉人为奴,这些奴隶中,除西胡、零丁人外,大部分

①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第376页。

② 如月氏、匈奴、突厥等族裔向中亚、南亚一带迁徙。参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载牛森主编《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3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④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02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0页。

为汉人。^① 东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南匈奴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② 可见汉人流落于匈奴的人口数量相当庞大,这些汉人中有相当部分也充实或融入匈奴之中。

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汉人除迁徙到长江以南地区外,也大量扩散于西北、东北和西南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逐渐充实或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唐高祖李渊曾言“自倾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③指的正是这种情况。所谓“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正是汉人“走胡奔越”、大量扩散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果。

多年前,笔者到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调查,在岷江上游最大的萝卜羌寨惊讶地发现,不仅家家堂屋所供牌位均是“天地君亲师”,寨后庙宇所供奉神祀也皆是汉地神祀像系统。完全印证了“礼失求诸野”和“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古训。在甘青地区普遍存在的“文昌”信仰、青藏高原等地的关帝信仰、将军信仰等等,都无不体现了“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情形。^④ 这同历史上各个时期汉人大量扩散和迁徙及融入少数民族之中有直接关系。

明代大量汉人移民迁入云南,明末蜀乱和清初“湖广填四川”等,都使汉人大量扩散到西南各少数民族之中。明清以来,汉人很大程度还成为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发生交流联系的中介。^⑤ 清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大力经营和开拓康区以及西康建省,也使汉人大量迁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与当地藏人发生广泛交融。清朝至民国时期进入青藏高原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曾有如下记叙:(汉人)“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立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

① 林幹认为匈奴所劫掠奴隶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约有50万人左右;马长寿认为匈奴的奴隶数量占匈奴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参见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321页;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第108-109页。

②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8页。

③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④ 参见曾传辉《青海省贵德县文昌神和二郎神信仰考察报告》,《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0-129页;马清虎《安多藏区关公信仰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9-145页;郭建勋《将军信仰与隐喻的康东社会进程——以川西贵琼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第119-125页,等。

⑤ 参见许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译《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17页。

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①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人落籍于当地,也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所以,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所带来的汉、藏互动与交融,其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入,即汉人大量充实到藏人之中。^②

总之,在史籍记载中,历史上各个时期汉人的扩散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大量融入各少数民族的例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费孝通指出:

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个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复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至于有人认为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必然会融合于经济文化较高的民族,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历史上确有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融合于四周的其他经济文化较低的民族。^③

历史上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始终是相互流动、彼此融入的。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委托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该行动引发一个事件。当地的苗族代表给蒙藏委员会写信,反映他们实际上早已汉化,与汉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把他们重新当作苗族,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尊重。^④这一事例说明,在实际生活中,民族身份与主观意识实际上是动态的、流动的,并可以发生变化。

即便今天,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流动与转换也从未停止。今在川鄂湘黔相连接的武陵山民族地区,由于苗族、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相互杂居,日常生活中接触交流极为密切,苗族、土家族受汉文化熏染显著,于是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上呈现一种高度混同的状态。对这种高度混同状态,当地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叫“非苗非汉”或“非土非汉”。这是颇具典型意义和启示性的文化案例。它充分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民族身份与民族意识并非固化或非此即彼。事实上,在实际生活层面,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是动态的、流动的,可以相互转换。正因为如此,才出现所谓“非苗非汉”或“非土非汉”的情况。事实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界线从来是动态而非静态、是相对而非绝对、是流动而非固化的,二者时常相互流动和发生转化。这种情况不但历史上如此,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亦比比皆是。

所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生活层面,汉族与少数民族始终紧密交织。二者的关系不但表现于汉族之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中也吸纳和包含了大量

① 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1936年第9卷第4期。

②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1页。

④ 石青阳《致蔡元培函》载《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93,案卷号:280。

汉人成份,同时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容纳、相互流动、相互转化并彼此融入。所以,从根本上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更不是对立的。这应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出发点,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四、避免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两分或对立的思维模式， 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

既然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同属中华民族,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是什么造成了两者的差异与分别?

事实上,有一个因素常被我们忽略,这就是中国多样化的地理生态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三级阶梯构成。第一级阶梯是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是在青藏高原以东和以北的一系列宽广的高原与盆地,如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海拔在1000-2000米;第三级阶梯是我国东部平原与丘陵地区,海拔在500米以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仅有大片宜于农业的平原、盆地,也有大片完全不适于农业的高原、山地和草原。

前已提到,汉人的形成和不断壮大,主要因其从事农业。农业定居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稳定性和延续性,使汉人能源源不断地消化、吸纳进入农耕区域的各个民族。所以,农业不但是汉族形成、发展的根基,也是其最大特色。但农业本身具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与选择性——只有在宜于农耕的地区,农业经济才能产生发展。从此意义说,“以农为本”既是汉族的优势,也是汉族的局限。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其疆域内并不是所有区域均适合农业,这进而决定了汉族在草原、高原和偏远山地等并不适合农业的区域难以大规模聚集和立足。恰如费孝通所指出:

现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汉人不习惯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原、山沟和干旱地区以及一时还达不到的遥远的地方,也就是“以农为本”的汉族不能发挥他们优势的地区。这些地区只要汉族停留在农业时代对他们是不发生吸引力的。^①

少数民族聚居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形成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不同的经济类型。

从根本上说,中国多样化地理环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形成差异和分野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主要在于经济类型的不同,这由我国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所决定。因此,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是我们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差别的重要依据,也是认识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相互依存是经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7页。

济上的普遍定律。正因为如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因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而造成经济类型的差异,并未带来彼此的区隔,反成为二者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有一个根本原因,即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脆弱性使其本能需要向农业区靠拢,需要借助农业地区富饶的财富和实施农牧产品的交换、流通与互补来发展壮大自己。所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互动与交融,从根本上说,是农、牧经济互补的需要所决定的。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类型上存在的差异,同样成为二者经济生活方面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重要原因。诚如费孝通指出: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面可以提出来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特别和汉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国内其他各民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长期深入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遍布全国,构成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收和传播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民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①

费孝通还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密切联系有如下生动描述: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的大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所以要在县一级的区域里,除了西藏和新疆外,找到一个纯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乡一级的区域里也不是常见的。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况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民族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深入到各少数民族的这个队伍,发挥它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②

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③

因此,在现实生活层面,并不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截然分割及对立。恰好相反,二者乃密切依存、联系与交融一体。

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

^① 费孝通《代序:民族研究——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6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6页。

与一体性的坚实基础。经济类型的差异和互补,正是促成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度依存、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因。不但历史上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翁独健称“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①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对民族而言,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有机联系和紧密依存,奠定了中国各民族共同文化与政治统一的基础。史学家蒙文通指出:“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②梁启超将此“共同的传统文化”称作“主干的文化系”,认为“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涵盖,难以别成风气”。^③而这种“共同的传统文化”和“主干的文化系”,正是以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紧密依存和有机联系为其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成为一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多样性并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这是中华民族精髓之所在。严文明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时指出:

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④

这种“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众多兄弟民族”“既统一又保持着各民族特色”来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实为一种洞见。

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深刻体现于“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因此,将汉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甚至对立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不但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也有碍于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进一步消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因经济类型、社会传统的差异而带来的隔膜,在观念和意识上彻底消除和改变将彼此截然分割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增强和培育“三个离不开”的观念与情怀,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

因此,加强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单单是对少数民族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责任,更是对汉族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责任,需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都 610041)

(责任编辑:周陈)

- ①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 ②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3页。
- ④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页。

surrounding models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 and materials from the Eastern world are increasingly gaining prominence. This article: 1) reviews the origin ,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ajor hypotheses and models for the origin and behavioral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 , 2)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cent advancement , 3)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l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 , as well as model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behavior; 4) proposes to value the role of vast material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n discussions involving different models; and 5) reflects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dernity”. The author advocates for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to provide more substantial Eastern perspectives in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models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Keywords: human origin and evolution; modern human; modern behavior; East Asia; eastern perspective

Investigating the Inters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Subsistence Economy in the Surrounding Yin Mountain Region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FENG Bao(Hebei Normal University) (55)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various stages of the Pre-Qin period in the Surrounding Yin Mountain region demonstrate the diverse blending of cultural features from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the area ,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These materials als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regi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demonstrate that ,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rrounding Yin Mountain region was initially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owerful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at there was a cultural exchange process in which the region , as it developed , also exported its own culture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2) the region occupied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as a “crossroads” for long-term and widespread communication of Eurasian grassland culture; and 3) the evolution of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in this region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in bot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Eurasian grassland.

Keywords: surrounding Yin Mountain; pre-Qin period; archeology culture; subsistence economy; cultural blending

Studies on Theories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alit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SHI Shuo(73)

Abstract: A crucial aspect in comprehending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finding an appropriate wa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t posits that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re intertwined and interdependent, with elements of both groups present in each other. There is no clear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s a close one, both historically and in reality. The Han ethnic group is a product of integration and its composition and tremendous inclusiveness make i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 in geological positions,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types; however,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types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the two have become the very reason for the high dependence and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also demonstrate the commonalit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long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absorb each other, blend with each other,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thus an organic whole with both commonality and diversity gradually comes into being, which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quires shifting away from a mindset that separates the Han ethnic group from ethnic minorities or pits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Keywords: the Han ethnic group; ethnic minorities;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onality;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Population Consolidation

ZHOU Ping (Yunnan University) (89)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encompass not only its external attributes, such as its pattern and culture, but also its internal features, including the mechanisms and functions that are inherent to it. The Chinese nation, like other ethnic groups, is an expression of human's innate tendency to form clans, and a tangible manifes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an ethnic group through population consolidation” (ju min wei zu). The 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an ethnic group through population consolidation” serves the purpose of unifying multiple individuals into a single entity, or in other words, it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population consolid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has historically had a certain level of the function of population consolidation, as evidenced by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Upon being